

张海鹏史学论文选

求实集



本书反映了作者一生的治学轨迹。“文知其人”。阅读其中的文章，可以领略作者深邃的学术眼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懈的学术追求和亮丽的文字风采……

安徽教育出版社



求实集

——
张海鹏史学论文选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求实集:张海鹏史学论文选 / 张海鹏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5

ISBN 7-5336-4743-2

I. 求... II. 张...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33454号

责任编辑:彭克明

装帧设计:朱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回龙桥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东方红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5.5

字 数:298 000

版 次: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定 价:28.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822632

邮 编:230063

序

张海鹏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但先生的音容笑貌却经常萦回在我的脑际。我总觉得先生像是去出了一趟长差，不久还会回来似的。

记得2000年7月5日，正是先生70华诞，我们一群弟子设宴为其祝寿，看到先生精神矍铄、老树春深的样子，我们都由衷地祝愿他长寿。就在这次宴会上，他告诉我，近来食道感到不适，吞咽食物时有刺痛。我们都以为这可能是溃疡所引起的，建议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不必过虑。万万没想到，几天后先生到医院初步检查，医生就建议他立即住院。经进一步检查，确诊为食道癌中晚期。为了控制病情发展，医生决定采用化疗。先生忍受了极大的痛苦，顽强地和病魔作斗争，体质也急剧下降。一切药物用下去，都如水沃石，毫不见效，竟然在2000年9月5日撒手西归。住院时间前后还不到两个月。我们怎么也想不到，先生会走得那么快。他的离去，确是史学界的一大损失，不仅使徽学研究领域失去了一位奠基者、开拓者、领路者，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恩师。

先生1931年出生于安徽枞阳县(旧属桐城)，父亲是一位乡村医生。并不宽裕的家境使他没有机会去更多地读书。但桐城派故里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深深地影响了

他。他靠自学读了大量的桐城派文章，打下了坚实的学问根柢。1954年他以小学校长的身份作为调干生被选派到安徽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历史科学习。毕业后由于成绩优异留校任教，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今天呈现给大家的这本《求实集》，就是从先生生前所写的论文中精选出来的。

《求实集》选编了先生的37篇论文和序文。我们将它分成三组，第一组是关于徽学研究的12篇论文。这是先生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论文。早在80年代初期，先生还是历史系副主任的时候，就以其深邃的学术战略眼光，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组织课题组，开展徽商研究。他不仅亲自带领我们到徽州、合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收集资料，开展研究，编选出《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出版了《徽商研究》、《十大商帮》等著作，而且还亲自撰写了不少论文。从这组文章中可以看出先生对徽学研究的贡献。先生第一次提出并论证了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这一观点如今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在这一组文章中，有四篇是关于徽州盐商的专题研究。盐商是徽商的中坚，徽州盐商的盛衰折射出徽商的盛衰，抓住徽州盐商就抓住了徽商的关键。先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重点剖析了徽州盐商，厘清了徽州盐商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徽州盐商在两淮中的优势。清代嘉、道之际，徽州盐商衰落了。以往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只注意到他们裹足不前、破产歇业的一面，而先生

却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他们在盐业经营上虽一蹶不振，但一部分商人子弟通过饱读诗书，或衣章服，或入士林，即或任官，或为儒，位尊名高，门楣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徽州盐商通过另一种形式又“复兴”了。这种认识确实是深刻、独到的。

在徽商研究中，先生不仅见解深邃，而且视野宽广，不是就徽商论徽商。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注意到了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在明清几百年中所形成的“徽州文化”，独树一帜，自成派别。诸如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以及徽州朴学（皖派经学）、徽州篆刻、徽州刻书、徽派版画，还有徽剧、徽雕、徽菜等等，这种昌盛的文化，确是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多见的。先生通过深入的研究，第一次提出：“酿出‘徽州文化’的酵母则是徽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收在这组文章中的几篇徽商与徽州文化的论文，我们会深深服膺张先生提出的这一观点的。

先生晚年非常关注徽学的研究，他不仅早就指导课题组成员开展徽州教育和徽州学术的研究，从而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从理论上对徽学的定义、徽学的内涵、徽学形成的基因、徽学发展的“催化剂”、徽学的研究对象等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发表在《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理论版头条显著位置上的《徽学漫议》一文，就可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探索。

本书第二组13篇文章，反映了先生在中国古代史领域的研究成果。这组文章大致可分两类，前一类是对中

中国古代史上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十年浩劫，历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史学理论也被搞得混乱不堪。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是在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先生深入思考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一组的前三篇文章就是他思考的结果。《论“中国”》是作为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篇，他认为“只有着眼于‘大中国’这个范围，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才有可能得以正确解决”。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深入论证“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狭义的“中国”是指中原区域，它主要是华夏族的聚居地；广义的“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远及“四夷”聚居之地，实际上是一个“大中国”的概念。“中国”也是一个国家概念。他指出，过去人们大多认为只有汉族王朝才称“中国”，事实并非如此。秦汉以后，在“大中国”这个辽阔的疆域版图内，除中原地区的汉族王朝外，边境地区往往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它们亦自称“中国”，同汉族王朝自称“中国”无异。几千年来，“中国”作为王朝的专称，使用日久，便逐渐发展为我国名号的专称了，时间大约是明朝建立以后。那么中华民族人民为什么能够长期团聚在一起？因为各族同为炎黄子孙，民族间的不断融合又使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不断发展，儒家思想作为各民族的共同思想意识，也是维系民族团聚的一条无形纽带。《论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是先生当时参加史学界热点问题大讨论的成果，反映了他对这两个理论

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可贵探索。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动力作用或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他认为无论“革命旋风”时期也好，还是“平安宁静”时期也好，人民群众都是动力的主要源泉，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而且他认为，在讨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时，我们的眼睛虽然首先应该“向下”，即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作用，看到他们是历史的主体；但是，也应该“向上”看看，即从“高祖”、“太宗”们及其政策中去找动力，这正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此外，在讨论历史发展的动力时，既要正确看待社会的破坏，也要正确看待社会的进步。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缓慢发展，学术界当时进行了热烈讨论。先生另辟蹊径，从剖析中国封建经济、政治特点入手，就中外的具体历史情况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是与我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分不开的。其一，地主制经济结构内部的商品流通难以发展到足以替代自然经济的地步。其二，它的坚固性还表现在顽强地抵御外来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影响的能力，而且我国封建政权的阶级基础，同封建经济结构一样，也是“一元构成”，造成封建专制制度的牢固性与排它性，使萌芽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遭到百般打击和压抑。上述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很有新意的，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

这组文章的后一类是关于明清史研究的系列论文。先生从事明清史研究比较晚，可以说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文革前，先生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历史的教学，并

兼任历史系行政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历史系中国古代史力量较强,每一段都有人研究,只有明清部分是个空白。先生作为系里领导,为了工作需要,于是涉足这一领域。先生治明清史,也是从资料做起,即从研读《明实录》和其他基本史书打下坚实的基础。他的研究也是从初期开始,这组文章中关于马皇后、朱升的研究以及在第三组文章中关于朱元璋、刘福通的一些研究,可以看出先生治学的轨迹。明史学界的不少朋友都十分佩服先生,认为他虽然涉足明史领域时间不长,但却研究成果卓著,这正反映了先生横溢的才华和治学的勤奋。他生前就有计划,从明初到明末,一朝一朝地研究,如果不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转向徽商和徽学研究,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的计划是一定能实现的。

本书第三组文章是张先生为各书写的序言(前言)汇编。拜读张先生的序文,犹如身感春风拂面,耳聆玉珠落盘,煞是一种享受。他的序文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决不是泛泛空谈的“应景时文”,而是有着对问题的真知灼见,时时闪烁着思想火花。二是文字清新秀丽。他曾和别人谈过,在写作过程中,比较注意“磨”,比较注意文字修饰,亦即形式的美。这可能因为小时候读了一些桐城派的文章,受了影响。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论及治学方法时强调:“义理、词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用现在的话说,义理就是理论,词章属于文学,考据便是史料证据。古人治学重视文学修养,司马迁是很好的例子。先生回

忆：“我在做学生时，就爱好文学，注意写作技巧，遇到好文章，总要读两三遍，主要是学习这些文章的写作方法、结构安排、材料引用、文字表述以及如何深化主题等。另外，写文章时先要明确谁是读者，对象不同，在文字要求上区别很大。读者看不懂就没有好的社会效果。”为了追求好的社会效果，他总是以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去精雕细琢。文字修饰，恰恰是很多史学论文所忽视的问题，先生确实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本书的附录部分，收录了3篇先生生前记者的访谈录和6篇先生的好友及弟子们的回忆文章，这组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先生的学问和人生，再现了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魅力。

先生去世后，我们就打算为先生编一部文集。先生的哲嗣、安徽师大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张健同志花了极大的精力从以往的报刊书籍中尽可能地收集了父亲的遗作，我和周晓光、李琳琦作为先生的弟子参与了此书编纂工作，我的师弟安徽教育出版社编审彭克明先生，为此书出版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际，推出此书，我想应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王世华

二〇〇五年九月

目 录

徽学漫议	1
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	7
徽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	33
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的优势	50
两淮盐商的衰落和徽商门楣的光大	70
从扬州到徽州的繁荣看明清徽商的历史作用	85
论徽商经营文化	107
徽商与徽州文化	133
徽商——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	143
对几份徽商析箸阁书的研究	149
从《汪氏阁书》看徽商的资本出路	175
徽商研究十五年	179
论“中国”	185
论“冤臣”	204
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218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	234
创新·守成·严谨	250
论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252
马皇后评述	272
朱升和《朱枫林集》评议	283
论朱升的从政和退隐	305

左光斗及其水利事业·····	321
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李岩·····	324
简论姚鼐的文学主张及其思想倾向·····	335
评吴晗同志的《明史简述》·····	348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前言·····	355
《中国十大商帮》前言·····	359
《徽商与明清徽州地区教育发展》序·····	363
《中国传统文化论纲》序·····	369
《历史学新论点》序·····	373
《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序·····	375
《明史论文集》序·····	384
《红巾军领袖刘福通》序·····	386
《洪武皇帝大传》评介·····	395
《皇子传》序言·····	397
《秦桧传》序·····	404
洪武六百年祭·····	409

附录:

张海鹏与徽学研究(王世华)·····	413
张海鹏与安徽地方文化史研究(周晓光)·····	425
张海鹏先生的史家风范及其学术成就(李琳琦)·····	441
醍醐海阔 德性山高——张海鹏教授与明清史研究侧记(余同元) ·····	444
探索徽商精神——张海鹏教授访谈录(马宝珠)·····	461
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欧阳跃峰)·····	464

追溯徽商的辉煌——著名历史学家张海鹏教授掠影(刘小林)	471
.....	471
著述后面的人格力量——幸识张海鹏教授(杨俊).....	474
不尽哀思悼故人——深切感念良师益友海鹏公(吴仁安).....	477

徽学漫议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中期,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学术园地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其中,“徽学”也在群芳争妍中绽开了蓓蕾,成为地域文化中的一枝新秀。在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徽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掀起的“徽学热”,大有“升温”之势。

什么是徽学?徽学即徽州学,或曰徽州文化。它是在原徽州(府)下属六县(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所出现的既有普遍性又有典型性并且具有一定学术含量的各种文化现象的整合。它植根于本土,伸展于各地,即是由“小徽州”和“大徽州”文化融合形成的内容丰富、品位较高的一座文化宝藏。

其实,在徽州文献中,“徽学”一词早已有之,所谓“文公为徽学真传”,即是其例。不过,以往文献中的“徽学”,是指以朱熹为开山祖的新安理学,和今天所称“徽学”的概念及涵盖的内容不一样。前一“徽学”是单一的学科,属于学术史;后一“徽学”,包含了多种学科,属于地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徽学,其主要内容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文献、新安画派、新安宗族、新安商人(徽州在晋代为新安郡,后人常沿用这一郡名),以及徽州书院、方言、礼俗、戏剧、民居、谱牒、土地制度、佃仆制度、契约文书以及徽派朴学、版画、篆刻、建筑、盆景,乃至徽墨、徽砚、徽笔、徽纸……这些以“新安”或“徽”为标志的文化“特产”,反映了当日的徽州是商成帮、学

成派，并由此而构筑了“徽学”这座地域文化大厦。

徽州这个“山限壤隔”、“地狭人稠”的偏僻山区，为什么竟能形成如此斑斓驳杂的地域文化？考其缘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中原文化是徽学形成的“基因”；第二、徽州商帮是“徽学”发展的“催化剂”。下面，拟就此略作阐述。

关于“徽学”形成的“基因”，其来有自。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昔日的徽州大体是一个移民的社会，其移民多是来自中原地区。古代的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她又是战乱频率最高的地带。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战争，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战争，军阀割据之间的战争，民族矛盾引发的战争，农民革命的战争，经常发生于这一地域。每一次较大的战乱，都促使中原人口被迫南逃。其流徙的走向，大多是越过黄淮平原，渡过长江，而徽州这个“川谷崎岖，峰峦掩映”的“四塞之地”，恰似“世外桃源”，这正是南迁人口避难的理想之境。据方志载，徽州“各大族，半皆由北迁南，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此外，也还有在各个历史时期星散的由中原直接南来或辗转迁移到这里的，人数也还不少。他们“又半皆官于此土，爱其山水清淑，遂久居之，以长子孙焉”（民国《歙县志》卷一）。据明代嘉靖时人程尚宽纂修的《新安名族志》所载：到明代中期，新安“名族”共 84 个，追本溯源，大约有 80% 以上是来自中原地区。这些移民，与由中原迁徙到闽、粤、赣山区“客家人”的移民大抵相同。

上述由中原迁到徽州的移民，或为世家大族，或为缙绅冠带，或为硕学鸿儒，亦有黎民百姓。他们定居于徽州后，便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带进了这个山区，并逐渐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

迁到徽州的移民，首先带来了中原儒风。徽州这个古山越人居住的山区，《汉书·地理志》“黟（黟）”县条注中，犹称为“南蛮夷”

之地。六朝以前,这里“武劲之风”很盛。其人不识诗书礼乐。随着中原人口的迁来,才“渐染儒风”。最明显的是读书和尚礼的风气传到徽州之后,社会习俗为之一变。读书之风逐渐兴起,所谓“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矣”(康熙《祁门县志》卷一)。明清时期,徽州更是“儒风独茂”。由是“‘人文辈出,鼎盛辐臻,理学经儒,在野不乏’,以致‘四方谓新安为东南邹鲁’”(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与“诵读”之风吹拂这个山区的同时,中原的崇礼义、明人伦、务俭朴的习俗也给徽州以广泛的影响。文献谓:“新安自昔礼义之国,习于人伦,即布衣编氓,途巷相遇,尊卑少长以齿。此其遗俗醇厚,而揖让之风行,故以久特闻贤于四方”(《太函集》卷一)。这“醇厚”的“遗俗”,正是“遗”自古代的中原,而且还延及后世。我们只要读几副黟县西递村的旧楹联,曩时这里的社会风尚,犹恍如在目:“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传家礼教悖三物,华国文章本六经”;“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自六经得来”;“凛遗绪于前人克勤克俭,善贻谋于后世学礼学诗”。“读书”、“礼教”、“文章”、“五伦”、“六经”、“勤俭”本为中原“旧物”,唐宋以后,则在徽州生根、开花、结果了。

其次,徽州的移民还带来了中原的宗族文化。那些“由北迁南”的移民,大多举族而来。迁到徽州后,依然聚族而居,这既有利于抗御外姓的欺侮,又能保持在宗法制度影响下形成的“家(族)风”。所以一些大姓的村落,“绝无一姓搀入者”。徽州的名族,莫不“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人们重宗谊、修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歙事闲谭》第十八册)。这种宗教制度,一直顽固地保存下来。明末清初之际,徽人赵吉士在他的《寄园寄所寄》中对徽州的风俗作了如下介绍:“父老尝谓新安有数十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这些经过

“数十世”传承下来而且“胜于他邑”的习俗，不啻是昔日中原地区宗族文化的活标本。

这里值得提到的是，南宋时期在徽州出了一位大儒朱熹，他的“朱子之学”或称“紫阳道学”，在徽州的影响极深。而朱子的“学系”是上继北宋二程的，二程的“河洛之学”亦是中原文化。所谓“朱子得河洛之心传，以居敬穷理启迪乡人，由是学士争自濯磨以冀闻道，风之所至，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光绪《婺源县志》卷三）。自南宋以后，徽州人多是“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休宁茗州吴氏家典·序》）。在“朱子之学”的倡导下，徽州的人伦教化，不仅与中原儒风一脉相承，并又有所发展了。诚如曾国藩所言：“徽州为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曾文正公全集》卷四）。确实，自朱子之后，徽州乃是名符其实的“彬彬乎文物之乡也”。其“典章文物”莫不抹了一道“朱子之学”的光环。

由于上述中原文化在徽州的长期积淀，从而生成这一地域文化亦即“徽学”的“基因”。同时，在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又不断吸纳融化了外界的文化“因子”，这更为“徽学”的形成加厚了底蕴。

关于“徽学”发展的“催化剂”，则是这一地域的商帮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是难以酿造出高品位的文化的。徽州本是“地隘斗绝，厥土驛刚而不化”的贫瘠山区。随着外地人口不断迁入，兼以“生齿日繁”，当地所产不足以自给。为生计所迫，徽州人不得不寄命于商。到了明代以后，“出贾既多，土田不种”，形成“贾者十之七，农者十之三”的局面。在一个地区之内，从商人数的比例如此之大，则为其他地域所罕见。徽商“业儒”出身的人较多，他们在商场角逐中，能够审时度势，精于筹算，善于取予，并以“徽骆驼”精神，不辞艰辛，所以有不少人便很快“家业隆起”，即所谓“五年而中